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四期 ——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408b)

【文革反思】	和吴迪对话：关于文革的记忆	吴 迪
【文革一页】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阎长贵
【亲历者言】	1966年初识王洪文	侯美度
【五洲震荡】	珍宝岛事件与中共九大	雷 颐
【史实辨析】	白纸黑字红镜头——《共和国红镜头》中的瑕疵	张光瑜
【拒绝遗忘】	国家道歉和法律赔偿	唐 燕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反思】

和吴迪对话：关于文革的记忆

• 吴 迪 •

六年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迪（笔名启之）决定办一份跟文革有关的电子月刊，取名《记忆》，因为“说的是过去的事”。促使他产生这一念头的原因很简单：他写的有关文革的书无法在大陆出版，他就想用这个平台发表那些分享同样命运的文字，然后通过邮件发送给学界同仁。他攒了三期自己的文章，因为担心一开始不会有人投稿。没想到《记忆》第一期间世后，外稿就蜂拥而至，以至于吴迪自己的文章都排不上队了。

这种意想不到的反响，在吴迪看来，说明了“供求关系”——社会急需一个倾诉浩劫、反思历史的出口。

今年63岁的吴迪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北京四中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喜欢读书的他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暴力革命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大部分时间躲在图书馆里看书。两年后，他和同班同学“上山下乡”，被分配到内蒙古土默特旗

插队。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并最终让他走上了独立研究文革的道路。

插队期间，一个外校的知青偷了他们队的几个知青的钱粮票，知青们群情激奋，把那个小偷揍了一顿。公社武装部要把这些打人的知青抓起来，吴迪替他们说话，结果把他也抓了起来，在一座挂着“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正规监狱关了一百多天。在狱中，他结识了很多被打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难友。

“内人党”是1925年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破裂之后该党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投靠国民党，左翼投靠共产国际。日本投降后，中共派当时的开国上将乌兰夫收编了“内人党”左翼，其党员集体转入共产党。文革伊始，乌兰夫被打成反党叛国集团的头子，“内人党”成了他反党叛国的地下组织。内蒙古的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内人党”而不是共产党。很多人因此入狱，遭受凶残的刑讯逼供。吴迪在和这些人共处一室的过程中，了解到其中的隐情，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冤假错案。他深受震动，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中，他坦言：牢狱之灾给了他一种使命感，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1984年，吴迪在北京大学上研究生期间，曾向导师季镇淮教授提出，要研究文革史，但未被批准。于是，他只好私下收集资料，一放假就往内蒙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一边教书，一边研究，最后用了四年多时间，完成了长达49万字的《内蒙文革实录——从“民族分裂”到“挖肃运动”》。此书于1991年竣稿，但直至19年后才在海外问世——2010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如果不是今年年初宋彬彬道歉一事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吴迪和他的《记忆》可能至今仍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吴迪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很少参与公众发言和讨论。文革虽然在国内是一个敏感话题，但吴迪自称，由于《记忆》没有网站，只靠朋友间的通信存在，加之传播数量非常小，所以国安纵有光顾，倒也高抬贵手，允许《记忆》苟活至今。

其实，早在2010年4月，《记忆》就刊发了北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这个专辑登载了这所学校的校友叶维丽的论文，刘进、冯敬兰等人的口述、刘沂伦的回忆文章，以及相关的史料。此后《记忆》一共刊发了六个专辑，研讨这个学校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革历史。这所北京著名的女校，在文革之初（1966年8月15日）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该校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她的学生，一群花季少女殴打折磨致死。13天后，该校的高三学生，中共开国元勋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得知她名字来自于“彬彬有礼”，就对她说：“要武嘛。”此后，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以抄家打人为实的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短短一个月内，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而宋彬彬则因为给毛主席戴红袖章而成为红卫兵血腥暴力的符号。

2012年，宋彬彬在《记忆》上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但是，由于没有社会媒体的参与，并未在社会上引起特别大的关注。去年年底，陈毅之子陈小鲁道歉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后，女附中的校友受到鼓舞，与《记忆》在北大法学院共同举办了反思文革座谈会，随后，女附中老三届又召开了与老教师的见面会。会上，宋彬彬等老三届的学生向老教师们道歉，并与老师们共同控诉、反思文革给教育、给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吴迪等人的力主之下，这两个会议邀请了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记者参加。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当年给毛戴红卫兵袖章，以及父亲是中共开国上将的关系，宋彬彬成了两种政治符号——文革暴力符号和“红二代”当官发财符号的兼任者，虽然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前往美国留学，之后在美国过着普通职员的生活，既未当官，也没发财。她的道歉引来了无数

的置疑、痛斥、谴责，以至咒骂。受女附中启发，准备以之为模板，与中学老师共同反思文革的某些北京老三届，在这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声中怯步不前。吴迪试图以《记忆》为平台，将民间反思文革推向纵深的计划也由此泡汤。

5月18日，吴迪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就如何看待宋彬彬道歉引发的争议，和如何反思文革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你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

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兼备两种符号，在她道歉之前，她是红卫兵滥杀无辜的暴力符号。而在她道歉之后，她又成了红二代在改革中利用特权发财升官的符号。另一方面，那些在文革初期有血债的老红卫兵，没有受到惩办。而作为红二代，他们又受到了提拔重用，占据党政军的要津。这是一个历史积怨，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公——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而施害者却平安无事，甚至升官发财。当无辜受害者是以“黑五类”为主体的平民百姓，施害者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五类”的时候，这个历史旧案，就具有了阶级迫害性质。

纽约时报中文网：怎么看待宋彬彬成为这两种符号？

吴：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并没有打师长，她还劝阻了打人的学生。她的家庭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迫害。但是，谴责派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不想让宋去符号化。因为他们需要这个符号，以便通过打击宋，达到抨击现实的目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有血债的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受到惩办？

吴：说起来话长了，这是红卫兵运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直接的原因是八十年代制订的政策。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分析79年胡耀邦对彭小蒙（北大附中红卫兵）来信的批示，一篇是分析84年陈云对孔丹来信的批示。这两封信都发在《记忆》第112期上了。简单地说，胡耀邦的批示只是说了一番如何教育青年的套话，陈云的批示则使有血债的老红卫兵逍遥法外，其中一些人还被列入第三梯队，受到了提拔重用。比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作为“八·二四事件”（1966年8月24日）的领导者，他指挥北京市12所学校的上千名红卫兵，拆毁了清华二校门，对数百名教师进行了毒打，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然后强迫大批教师清理二校门的残砖破瓦。又比如，被号称为将军的干部子女马楠，把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蒋南翔的继母当着蒋的面，吊起来毒打。手段恶劣，令人发指，这些人在清华实行了长达半个月的“红色恐怖”。而在陈云的批示之下，全部解脱。清华人告诉我，对马楠等人进了口头教育，不记档案。贺鹏飞后来参军提干，官至海军中将。

反思文革需要哪些力量推动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是文革研究者，又办了《记忆》这样的刊物，你认为应该如何总结教训，如何反思历史？

吴：总结教训，反思历史，从操作层面上讲，有好多事可做。比如，抢救史料。最要紧的是请亲历者口述，请有写作能力的人撰写回忆录。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批一批地走了。他们脑袋里装的是活史料。不抢救下来，就会永远地消失了。其次，是整理当年的小报传单，把它们电子化。有一位文革资料收集者，攒了三间屋子小报传单，东西多的屋里放不下，放到了阳台的书柜里，结果阳台漏雨，把那些资料全部泡在水里了。很可惜。把这些资料用高拍仪扫下来，存到电脑里，这是目前记忆最迫切的工作。它需要耐住寂寞，几年如一日。

现在有两个不好的倾向，一是不重视研读资料，凭着经验和感觉发议论。这种反思文革的学者很有一些。他们的言论可能轰动一时，但多是浮在表面。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领域单一，研究视野狭窄。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文革政治史的研究难以为继。因此，要开拓那些不依靠档案就可以研究的领域，比如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语言文风。近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文革语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反思，是清理文革的思维方式。人们不断地说要防止文革重演，其实，文革不可能重演。因为有了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要说重演，重演的主要是文革的思维方式。而且，它早就重演，并且当下还在重演。

比如，文革的源起，就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批清官秘史。通过断章取义，五子登科，无限上纲等手段，将对手打倒。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宋彬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同样是历史研究的事，而批判者同样把它政治化，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诛心诬陷，其方式和文革期间的“扣帽子、打棍子、挖根子、揪辫子”等这些批判手法，非常相似。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些谴责引起了什么后果吗？

吴：直接的后果，就是阻碍了对文革的反思，打断了北京老三届对本校历史的清理。

北京有几个中学的老三届也想像女附中那样，在母校搞个与老师的见面会，为当年的行为向老师们道歉，师生共话当年，反思历史。可是，网上对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觉得：现在社会上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力量太大，尤其是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公知”，鸡蛋里挑骨头，脱离实际，上纲上线，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有理。而媒体为了抓大众的眼球，不管他们是作秀还是求实，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大肆宣传。这些人也以舆论领袖自居，满足于出风头的快感，不考虑社会效果。

我遇到了一件事——有一个67届老高二，文革初，当过一阵校革委会主任。他在学校设立了牛棚，逼迫老师们写交待，唱《嚎歌》，使老师受到很大伤害。受女附中的启发，他想给老师道歉，把发言稿给我看，发言稿上有“不但没有保护老师，还虐待老师”一类的表述。他问我，这样写是不是会被认为，他到现在还抱着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对待师长？——朱学勤在《吐尽狼奶，开口奶，从宋彬彬道歉谈起》的文章中，就是这样指责宋彬彬的。

部分“公知”不顾事实，劈头盖脸的大批判，吓退了想反思文革，向老师道歉的人。或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将理性反思引向历史纵深”，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却反而将反思引向了死胡同。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

吴：是一种激进主义。有了激进，就有革命。文革就是近百年来激进主义的总爆发。文革结束，激进主义没有得到清算，它移步换形潜藏在人们的头脑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出来露一小手。这次宋彬彬道歉，激进主义就大大出了风头。因此，反思文革的第一要务，就是拒绝激进革命，回归渐进改良。我信奉李泽厚的主张，中国需要改良主义，一点一滴的改良。革命容易改良难。改良需要耐心，需要妥协，需要肚量，你要学会跟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改良是壕堑战，壕堑里没有鲜花掌声，那里面只能做最平常最琐碎的事。基于这一理念，我用八个字给《记忆》定位：学术、理性、包容、低调。

纽约时报中文网：《记忆》办了六年了，在这六年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遇到过哪些挫折？

吴：感受很多，最深的感受是中国的历史政策亟待改变。邓小平时代的“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是把文革冷冻起来，以便搞经济。在浩劫刚刚结束，派性纷争不断，政经急待改革的情况下，这种冷处理是必要的。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措施，不能作为长久的治国大计。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历史政策应该解冻，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做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但是，当政换了三届，文革仍在冷冻之中。它造成的负面后果越来越突显。

首先是大面积的思想混乱，因为官方回避历史真相，青年一代对父母经历过的事懵懂无知，懵懂无知就无从判断是非好坏，失去了判断力，糊涂混乱就会随之而来。举个例子，有些少壮派给《记忆》投稿，用改革中的不足和缺陷，证明文革中的斗批改是必要的。

其次，是文革那一套非黑即白，激进、偏执、狂躁的东西成为普遍的知行方式。甚至连学者专家、某些“公知”都在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批判文革。加上前面讲的思想混乱，社会呈撕裂状，有共识网，却没有共识。对立化、碎片化非常严重，在这种理性稀少，戾气充斥的大环境中，《记忆》要坚守客观、理性、学术，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得罪很多人。

比如，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国内外的研究者有分歧。彼此互扣政治帽子，海外的说国内的学者是官方的应声虫；国内说海外的研究者迎合西方的口味。双方互相攻击，以至粗口相向。《记忆》劝大家冷静下来，互相取长补短，想一想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国内的研究者应该看到，由于语境的关系，自己确有“犬儒”的一面。国外的研究者则应该承认，由于身在海外，在资料上有欠缺，在观点上免不了有偏颇。可是，《记忆》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把自己变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记忆》很少约稿，基本上都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女附中的找我，北大的找我，研究林彪的找我，写回忆录的找我……，最初，我担心稿子不够，后来担心稿件积压。一个小小众刊物，既不发稿费，又没多大影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投稿呢？说明社会有这个需要。

《记忆》的宗旨是三个面向：面向青年，面向业余，面向民间。《记忆》刊头上有四句话：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史研究。这四句话说的就是《记忆》的作用。从这六年的实践来看，《记忆》也确实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孔道，它也保存了历史资料，女附中文革专辑出了六期，加上以前出的有关文字，有六十万字。其中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由《记忆》发表的，一旦发表，它就没法消灭，也没法封锁。研究文革，尤其是研究红卫兵运动，文革暴力，十七年教育的人，都需要检阅这些资料。如果没有《记忆》，这些资料就会流失。另外，《记忆》促进了学术研究。《记忆》要求首发，《记忆》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学术水平不低，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国际一流。当然，这要感谢包括香港《二十一世纪》在内的刊物，因为他们的拒稿，才使这些高质量的稿子流向《记忆》。所以，我一直说《记忆》能办到这种程度，首先得感谢党，其次得感谢《二十一世纪》。

记忆不上网，没有自己的网站，它也不是什么抢人眼球的宣传品，它不谈政治，只谈学术，不谈主义，只讲问题。它是一个小小众刊物。我没想把它做大做强，只想把它做久做长。

□ 摘自《爱思想网站》

~~~~~

【文革一页】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1965年10月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各地的书店包括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都出现了排队买书的长龙。其热购和争购的场面，在建国后的图书市场上是空前的。

中共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问：印了多少？听说是十五万册后，他说：这样的好书，印一千五百万册也不多。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人陪同下，接见金敬迈，夸奖“《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好小说”。他说：“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参见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页，以下凡引用该书只注页数）

陈毅是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诗人，懂文艺，他对《欧阳海之歌》做这么高的评价十分可贵和难得！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金敬迈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他说，要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号召中南地区凡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干部、群众，都要好好地阅读这本书。陶铸还问金敬迈，目前对这本书有什么反映和意见。金敬迈汇报说，总政治部出了好几期简报，收集了军内外的很多意见，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是对作品的肯定。另外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首长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他当了国民党的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第6—7页）

江青的“指示”即意见和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还包括“军内外”许多人的看法）迥然不同。

金敬迈不愿改，特别是“最后四秒钟”，他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也有不少人夸奖那段描写。金敬迈知道不改不行，又舍不得“割爱”，很为难。

陶铸笑着望望大家，说：“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包括陈老总，大家都摇摇头，表示不明白“最后四秒钟”的描写错在哪里。

陶铸望着陈毅：“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他……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金敬迈听了陶铸的话，非常激动，觉得得救了。（第7—8页）

我们接着谈谈江青为她对《欧阳海之歌》的意见——不，是“指示”，召见金敬迈的情况。

1967年4月5日就通知金敬迈立即从广州来京，等候首长召见。一直等到11日才召见。其阵势十分壮观，参加者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权和掌权的人（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乎都到场了。江青坐在正当中。

召见时，还没等金敬迈坐下，江青就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劈头这几句，把金敬迈吓傻了。他既觉得莫名其妙，又感到委屈。江青的意见她确实认真考虑过：我什么时候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了？我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描写小海砍柴、烧炭卖炭，就一次跟着妈妈去要饭，回家的路上被地主家的狗咬了，他躲到柴屋里，折断打狗棍，表示饿死不讨米。这怎么是歌颂流氓无产者呢！再说，小海的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但并没当成，他路上就跑了，一直躲在外地当长工。长工不就是我们要歌颂的雇农吗，他和“反动军人”有什么关系呢！

金敬迈不敢申辩。

“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联那部电影《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动。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出这段描写的要害。哼，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金敬迈想，《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金敬迈接着想，这会儿，我才明白“非改不可”的意思：“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写英雄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和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一样，是写了欧阳海“对死亡的惧怕”和“对生命的留恋”，是污蔑英雄，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段苦心琢磨出来的“得意之笔”，原来与修正主义“异曲同工”，是“阴暗心理”的大暴露！

金敬迈说：“我是准备修改的。可我没完全听明白您的意思。”

“谢镗忠这个人真是没有用！”江青不满地说，“连传达个意思都传达不清楚，还是个什么‘文化部长’呢！”

金敬迈赶紧申明：“这不怪谢部长，怪我。”他不敢说他舍不得那“最后四秒钟”的描写，更不敢申辩“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与《雁南飞》毫无关系。

还没等金敬迈缓过劲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她停了停，“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我告诉你，陶铸这个人很坏，是个‘两面派’。我每次去广州，他

表面上很热情，其实暗地里都要派人跟踪我，名义上是什么‘保卫’，实际上，就是盯我的梢，监视我……同志们，我在广州不仅没有自由，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呀。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陶铸叫你加上去的？”

金敬迈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

江青怒气未消，冲着金敬迈说：“你自己写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你这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嘛！你这是明目张胆地搞‘两个司令部’嘛！你说说，你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

金敬迈不敢回答是哪个“司令部”的。他说：“我……我一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周恩来看见金敬迈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拐了个弯，说：“要正确领会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是江青同志在关心你，爱护你，赶紧按江青同志说的办……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五十万册《欧阳海之歌》赶印出来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按：实际上，不是五十万册，是六十五万册，见第63页——笔者）。不删去刘少奇在《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是不行的！”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你不能放了毒，便一走了之！”

“你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周恩来说，“我看批判和消毒的工作也要做。不然群众也通不过。另外，我们也要自觉地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嘛。还是按江青同志说的办。”

“小说怎么改，你要听总理的。”江青客气地说。

“不，不，不，”周恩来说，“听江青同志的，要听江青同志的。”

总理说着说着，笑着站了起来：“当然是听江青同志的。”

其他的领导人都跟着站了起来。只有江青仍然靠在沙发上。

周恩来又向江青点了点头，江青这才站起来，一脸的不高兴：“我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要听总理的。”

接着江青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望着金敬迈说：“来来来，今天呢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们，“我们大家作陪。”（参见第11—16页）

这场戏算演完了。够精彩吧！

在这里先谈一下江青对陶铸的诬陷，她说她到广州陶铸派人借口“保卫”监视她、跟踪她，她连人身安全都没有，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她在文革中惯用的手法，她对她要整的人都这样，没有例外。就拿江青到广州，陶铸夫人曾志说，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参见《一个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提出“从一而终”无限忠于毛泽东的陶铸能够不尽心尽力吗？江青完全是昧着良心诬陷陶铸。

我们回到江青召见金敬迈这出戏。这场戏的主角就是江青——她不愧当过演员，还是一个“明星”。周恩来，中共中央不仅名副其实而又名正言顺的第三号人物，是配角，在这场戏中只



有他们两个一唱一和，周恩来话虽然说得比较缓和，但主旨是以江青意志为意志，即贯彻江青的意见——“指示”，劝金敬迈接受江青的意见——“指示”。莫说其他在场的其他领导人了，就连两个当时中共中央的第四、第五号人物，即陈伯达、康生，都一言不发，连“跑龙套”都算不上，只是旁观者！江青何许人也？她当时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行政九级，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可是她的权力和威风何其大也！金敬迈说得深刻和到位，江青是“绝不亚于第二号人物”的“特殊人物”！我仿佛还没见过有书和文章写出江青这样的威风，所以我为我这篇拙文拟了这样一个题目：《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大概还算“名副其实”吧。

## 二

江青的威风从何而来？金敬迈不仅细致和精彩地叙述了江青在文革中的凛凛威风，也深刻和到位地揭示了她这种威风来自哪里？或者说，是怎么来的？

为回答这个问题，金敬迈在书中引了江青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的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这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第95页）

金敬迈解释江青这段话说：她的那个“一，二，三”，什么共产党员哪，工作人员哪，和那个第三才是什么呀，真是精彩绝伦，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最好的注释，用它来做这句成语的范例，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第110页）

“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她的惹不起，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第117页）

“撇开文艺不谈。有多少资格比你（指江青）老，水平比你高贡献比你大、身上还带着弹片刀疤的老同志，对你要让三分怕七分呢！你不就是谁身边的‘工作人员’吗，你不也是个共产党员吗，就凭你那个‘第三才是’，你就一会说‘这个人很坏’一会又说‘那个人一直反对我’，要不就是谁对你有‘刻骨仇恨’谁对你‘不共戴天’，然后就一个个抓起来投入监狱。你逼得多少人发了疯，你逼得多少人投河自尽上吊自杀啊。”（第117页）

金敬迈是否说得很深刻、很到位？我认为很深刻，很到位。

我补充几句。江青还经常说这个“坐探”那个是“特务”。我自己就是被她诬陷为“坐探”的。我诚心诚意尽心尽力给她当了一年秘书（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她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半（1968年1月—1975年5月），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5年11月（当时她还在台上）专案组给我做结论，说我“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实际指我呈江青一封群众来信，她不满意，由此断言我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安插在她身边的“坐探”。（参见江青在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讲话）

再举两个例子。先烈孙炳文（朱德挚友，他和朱德都是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之子、曾经做过朱德秘书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决，半夜听广播，听到江青说他是大特务立刻就上吊了。原来孙决是应付自如的，他认为，有档案有审查结论，早晚会给他澄清。江青说话了，他还有可能平反吗？还有孙决的胞妹孙维世，她是烈士遗孤、周恩来的干女儿、著名导演，

因留学苏联，江青污蔑她是苏修特务，被关进监狱。据说周恩来曾劝孙维世在监狱中坚持，像游泳一样，一定能游到对岸。孙维世给周写信说，她坚持不下去了，就自杀了。江青一句话就死一个人，这里谈到的只是兄妹二人，江青在文革中究竟害死了多少人？

应该指出，金敬迈的看法，并非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相当普遍的看法。

搞文革研究的金春明教授明白而深刻地揭示了江青身份特殊和吓人的历史原因，他说：“所谓特殊身份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江青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的身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夫贵妻荣。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国至尊的皇帝和皇后，权力至高无上，留下的遗毒既深且浓。这也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对江青的看法。因此，江青的身价自然也就不同一般了。她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到处以毛泽东的代表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别人也很难分清哪些是江青自己的意思，哪些又是毛泽东的指示，别人很少有机会和可能去找毛泽东澄清。特别是当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成了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红太阳的时候，江青自然也就身价百倍了。”他又说：“关键时候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参见金春明：《“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4页）

关于江青，政治局常委（陶铸倒台后的第四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968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9—90页）

陈伯达说得非常对。这是他和江青长期近距离接触和共事而得出的精辟见解！

陶铸夫人曾志曾经指出：江青在文革前到广州去看文件等就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她在文革中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我作为她的秘书知道，凡是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一份也不少，其他待遇（如外出随车、警卫等等）都相同，在这几个人中她批文件最多，康生、陈伯达两个人加起来也赶不上她；她在九大当了政治局委员又怎样呢？虽然她没分管具体工作，自称“闲人”，但她到外地休养或休息，居然要一个或两个政治局委员（吴法宪，或吴法宪和李作鹏）陪同，哪一个常委是这样的，我看没有。江青处处都表现特殊，她是一个特殊又特殊的人物。为什么？就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江青曾说过“她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然粗俗，但很深刻。

金敬迈有段话说得很好：“首长（指江青）不是自称：我只是谁谁谁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游动哨兵吗？哨兵，你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的老百姓，不，岂止是老百姓，把全国全军全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第117页）

### 三

江青实实在在是靠了毛泽东，但是江青却竭力向人们证明，她不是靠毛泽东，而是靠自己，说什么她绝不像某某女同志仅仅靠自己的丈夫——她经常向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她只希望别人称她为“江青同志”，她不希望、不愿意别人称她“毛泽东夫人”，更不要说称她“毛泽东的老婆”了——这话只能有时她自己说说。

江青的最后一任保健护士马晓先讲过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件事。她说：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

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她对写“毛泽东夫人”有意见。她拿着“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信给我看，看完以后连打开也不打开，往一边一放，她不愿看这个。她说：“他们拿我当夫人看待，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当然主席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我可不学某些人那样靠死人活着。”实际上，我们感觉她说这话指的是×××，虽然她并没说明指谁。我觉得她对×××一直不满，说“她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对自己她是比较高估的。

江青说她不靠毛泽东，完全靠自己，是自吹自擂，是不折不扣的假话。毛泽东逝世前，即毛泽东在的时候，他虽然病得很重，人们（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普遍非常痛恨江青，连元帅，连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都无奈她何，因为“投鼠忌器”，然而毛泽东一归天，还不到一个月，她就被抓了，甚至还成了“反革命”！

（作者为原《红旗》杂志编审）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

【亲历者言】

1966年初识王洪文

• 侯美度 •

十年“文革”，一场浩劫。1966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形势下，曾经积极投入到运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看清了“文革”的实质。本文是笔者“文革”初的一段经历，提供读者研究参考。

1966年10月下旬，晚秋的中国，风不平浪不静，从北京串连带回“革命火种”的各地学生都在酝酿大的动作。上海，一批在九四事件串连认识的大学红卫兵，正在加紧筹划市一级红卫兵组织。

筹备会议于11月2日在人民公园召开。来自四所大学一所中学的二十几名学生参加了会议。开会要先读语录，这是规矩，我们念的是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读着这张大字报，我们仿佛看到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在向千军万马做战斗动员令，我们也是这千军万马中的一名小兵啊！

会上有人提议把司令部设在巨鹿路691号。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私业医生。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反修楼”与“反到底”兵团红卫兵许云飞见了面。

许云飞原是一司红卫兵，他们去抄家，他不愿去，被一司开除了。他就自己组织红卫兵。

许云飞是天生的演说家，一说话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了我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选定了工学运动，这条路选得好，选得对！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胜利之路！”

我们一鼓作气，在“反修楼”宣布成立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

11月5日晚，我们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包炮串联了上海部分工人造反派，在“首都三

司”驻沪联络站开预备会，商量明天“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名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工人姓名，我们记下名字，然后去通知他们。

上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起步较早，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特批40万上海工人从“四清”直接转入“文化大革命”。早在6月，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就贴出反党委、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设在愚园路311号一幢小洋房里，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扫“四旧”时，是红卫兵用一纸勒令把房主赶走了。

11月6日下午。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代表陆续到达“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有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锻工）、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干事）等。

我与周谷声、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林翌、许云飞等炮司红卫兵参加了这次串连会。

会议一开始，潘国平、谢鹏飞等人争先恐后地说厂党委、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说的和听的都哭了，会议在一片嘤嘤啜泣声中进行。

周谷声噙着满眶热泪，激动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用血和泪控诉了上海黑市委的累累罪行，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决心向你们学习，和你们一起把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倒，把上海市委、华东局的问题彻底弄清，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陈阿大忘情地把手一举：“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激情之余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在11月9日召开一个控诉上海市委的大会，同时向社会宣布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总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一提出，热情洒脱的林翌便一揽子包下来：“你们司令部设在我们司令部里，我们还有电话。”

潘国平亲兄弟般地捶林翌几拳：“到底是老朋友！”

散会了，工人走光了，许云飞把我们留下来，谈了他的顾虑。他不熟悉这些工人，有的是第一次见到。今天，他来晚了一些。他来的时候，工人已经在谈筹备会议了，要审查这些人。他是红五类出身，有些害怕，不要弄了半天，让坏人混进“工总司”。

包炮表示支持：“许云飞说得对，为了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性，有必要对核心成员进行审查，一旦发现劣迹，立即开除。你们炮司出人，我们出介绍信。”

我们的图章没有刻好，只能借用他们的介绍信。我们必须一天内完成十七个工人的调查（参加“串联会”的十七家工厂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工总司”核心小组）。

11月7日凌晨，王洪文等十几个工人，扛着一匹匹红布，挟着寒风，敲开了我们的门。“到布店造反来的”，王洪文说。我们把他们让在沙发上休息，也许是太累了，这些工人一会儿就打起呼噜，进入梦乡。许云飞拿起男宿舍仅有的几条棉被，轻手轻脚盖在工人们的身上。

“谁？”一个工人朦胧中睁开眼，一看是红卫兵为他盖棉被，顿时激动得握住许云飞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天刚破晓。一个个“政审”小组就悄悄地从巨鹿路出发了。王洪文他们还在睡梦中，我们没有吵醒他们。

许云飞和一个男生到上钢三厂调查戴祖祥，他们很仔细，找了许多人谈话，有厂领导，也有和戴祖祥一个班组的工人，有人反映其人有偷窃行为。许云飞毫不留情地决定把戴祖祥开除出核心组。江必雄调查陈阿大。调查王洪文的是我和周谷声。我俩都是在昨天会议上刚刚认识王洪文的，对他一无所知。同一天，我们还要调查黄金海，时间较紧，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去。

我不会骑自行车，读书时在操场上学过两次自行车，从来没有上过街，为了抢时间，只好冒一下险了。我在里挡，周谷声在外档，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我觉得挺刺激好玩，他却紧张得把心提在喉咙口。

骑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外滩、外白渡桥、提篮桥，沿着杨树浦路到底，国棉十七厂到了。

我们进厂后，没有立即找工作组，先浏览一下大字报，看看有没有写王洪文个人品质的大字报，没有发现。

我提出找工作组，他们是王洪文的对立面，如果王洪文有什么问题，他们不会不说。

言之有理，周谷声点头称是。

我们踏进一间整洁的办公室，一个四十多岁，剪着齐耳短发、面目可亲的工作组组长施惠珍接待我们。

她亲切地和我们握握手，请我们坐下，又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热茶。

我们拿出介绍信，说明来意——了解王洪文有没有劣迹。

“王洪文同志出身苦，当过兵。复员到我厂后工作表现一般。”施惠珍简略地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后，话锋一转，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王洪文在“文革”中的表现，从他第一个写厂党委大字报说起，一直说到他组织赶工作组。因为是她亲身经历，说得比较细。

周谷声不断向我眨眼睛，意思是说：施惠珍说的这些事，正好说明王洪文造反精神足，不能说明王洪文有什么问题。

“施惠珍同志，王洪文有没有判过刑，蹲过监狱？”我问。我们最怕这事，如果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混进“工总司”，“工总司”就不纯了。答复很明确：“没有。”

我和周谷声同时松了一口气，我用眼睛使了一个“可以走”的眼神，周谷声看懂了。我们一起站起来，向施惠珍告别。热情好客的施惠珍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还一直叮咛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找她。

从国棉十七厂出来，我们急急地赶到国棉三十一厂，不巧碰上了厂休，厂内空无一人。

我非常沮丧，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挪不动了。

周谷声也很失望，但又不甘心白来，他说：“你去问问看门的工人吧，问总比不问好。”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工人同志，我们向依打听一个人，你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做黄金海的人？”

“有，你们明天来。”

“明天我们没有空，依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判过刑、关过牢？”

“没有”，老工人干脆利落地说。

一块石头落地，就凭门卫一句话，黄金海也进了核心组。

11月7日晚，我们和包炮把“工总司”核心小组的名单定下来了，除了戴祖祥和神秘的岑麒麟（他是保密厂的技术员，中共党员，地址保密，我们无从调查他，只好“忍痛割爱”）“政审”没有通过，其余十五个草莽好汉以“工总司”核心组成员的身份住进了巨鹿路691号。巨鹿路又成了“工总司”的司令部。

潘国平，二十岁，复员军人，风度不凡，穿一身军便服，说一口北京话，常被人误认为北京红卫兵，他被推选为负责人。

王洪文，三十一岁，讲一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老练持重，清秀端庄。由于他是核心组唯一的中共党员，也被推选为负责人。

11月7日晚。“工总司”核心组成员和“炮司”红卫兵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巨鹿路691号召开，许云飞简略地介绍了我们“政审”的情况，“工总司”核心组表示完全同意。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 摘自《世纪》2014年第4期

~~~~~

## 【五洲震荡】

### 珍宝岛事件与中共九大

• 雷 颐 •

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中苏关系史专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提醒人们：“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所谓“重要历史背景”大而言之，就是中国正处于文革高潮，与苏联矛盾越来越尖锐、激烈。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此时派性斗争严重、几成“全面内战”，在这时要召开以“团结”为主旨的“九大”。要在这种“大”、“小”背景下，考察“九大”的召开与不到一个月前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的内在联系。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其基本设想是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实现“理想社会”。具体方法是由他一贯宣扬、提倡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在运动初期强调发动、放手、矫枉必须过正……所以，在文革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要求、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放纵下，武斗频发，迅速升级。文革初期改组后担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说，“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北京市委并不清楚，“‘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然而：“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页）

首善之区的首都北京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两派武斗更加激烈，由棍棒、大刀长矛发展到枪炮，一些地方甚至将军工厂的坦克车开上街头，参加武斗。军队大规模被派到地方“支持左派、军管军训”，结果不是“支一派打一派”就是不同部队、不同军兵种往往支持地方不同派别，直接、间接参加武斗，军队内部派性也非常严重。一时抢夺解放军枪支成风，派性越来越强，武斗迅速升级。

随着刘少奇和各地“走资派”的被打倒，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发生转变，渐渐强调“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实现革命大联合”。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表明此时他把召开九大、重建共产党组织权威提上了日程：“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9页）但他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各地武斗更加激烈，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召开九大。近一年后，到1968年夏多数省市才成立了“革委会”，但武斗仍然十分激烈，而且有向原来相对“不激烈”的北京蔓延的趋势。北京一些高校，也开始“枪战”，甚至有要制造激光武器的传闻。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武斗。

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因为广西发生严重武斗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以严厉措词规定：“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但许多地方武斗并未停止，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7月24日因为陕西发生严重武斗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以更为严厉的措词规定：“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三天后，即7月27日，毛泽东决定向武斗迅速升级的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但却遇到强硬抵制，五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毛泽东在2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五名最有影响的北京高校“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对这些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一直坚决支持、百般呵护，这次却提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从8月10日到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迅速批准了最后五省、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9月20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召开九大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毛泽东传》（下），第1526、1528页）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只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最后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二、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包括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修改党章等。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开始集中于整党建党和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1969年2月开始的。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具体内容为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毛泽东传》（下），第1545页）

从1968年夏秋起到此时近半年的时间里，各级“革委会”普遍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刘少奇被中央正式决议开除出党，为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召开九大、重建共产党组织权威成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不过，要在半年内结束两派激烈武斗、几乎是“全面内战”的状况，召开以“团结”为主旨的九大，实在不容易。此时，派性依然非常严重，一些地方仍有武斗。

如何消除派性、召开一拖再拖的九大；在九大后如何继续消除派性，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头等大事。



## 二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边界的珍宝岛爆发了两次严重武装冲突和一次火力接触。

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国防大学徐焰教授作了深入研究。他在《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一文说：1969年2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成立了‘虎饶前指’，对珍宝岛斗争做了细致安排。3月2日，‘虎饶前指’派出30余人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在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秘密掩护。此时，苏军接到驱赶中方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的通知，派出70余人上岛。战斗于9时17分打响。经一小时战斗，苏军死伤大半，所余人员撤回对岸，中国巡逻队也返回。据苏方宣布，当天军人死亡31人。此次战斗中中方阵亡24人，并失踪1人。”“3月2日战斗结束后，苏军又多次越过封冻的乌苏里江登上珍宝岛。3月15日，经请示中央军委，‘虎饶前指’派出百余人的步兵分队在炮兵掩护下登岛。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000多发，中方以步炮兵协同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汇报，肯定作战成绩后又表示：不要再打了。傍晚前，双方军人均撤出珍宝岛。3月17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又发生火力接触，随后苏军因江面解冻和岛上大量布雷而不再上岛。”

徐焰文章还透露：“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生前的回忆，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第二次战斗即3月15日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4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提出了‘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以消除国内严重的派性对立。”（《世界知识》2006年第13期）

时间经过精心选择，地点同样经过精心选择。

中苏边界共有7000余公里长，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完全是由历史上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对苏“一边倒”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边界问题并未成为“问题”，至少，未成为公开的、尖锐的“问题”。但从50年代末开始，双方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争论，随后发展成越来越激烈的公开论战，边界问题浮出水面。60年代初，苏联曾在中国新疆边境挑起事端，策动中国边民非法越境逃往苏联。边界矛盾越来越尖锐、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中苏双方于1964年2月开始在北京谈判。谈判中，双方都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划分边界，东段边界除黑瞎子岛问题悬挂以外很快得到了解决。苏联同意将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含珍宝岛（一直在苏联控制之下）在内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及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国，苏方控制的额尔古纳河地段200余平方公里岛屿也归还中国。

然而，此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敏感异常。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提出了100多年前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旧账。苏联谈判代表团回国汇报，谈判于8月中断。此后，双方国内都发生重大政治变化，赫鲁晓夫10月下台，毛泽东已准备发动文革，中断的谈判未能重启。

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最初达成的协议中已明确被划归中国，但由于没有正式签约，此岛与谈判中涉及的其他岛屿、地区一样，双方并未“交接”。所以直到1969

年，珍宝岛仍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但历史上，中国边民又一直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作业。文革中中苏关系更加紧张，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以后摩擦、冲突不断。这样，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至1969年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做了周密的安排。一个月后，珍宝岛爆发中苏武装冲突。

对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传》十分严谨地写道：“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毛泽东传》（下），第1561页）

由于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九大前后转为“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期望以此迅速消除文革中形成的严重派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  
【史实辨析】

白纸黑字红镜头——《共和国红镜头》中的瑕疵

• 张光渝 •

最近，阅读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由杜修贤（1926年生）提供照片和史料，顾保孜撰文的《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上下册）》（以下简称《红镜头》），这是一本很珍贵的文献性作品。杜修贤做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十六年，后期又跟过毛泽东，他提供的照片和讲述的内幕新闻很有历史意义，是第一手的资料。杜修贤本人则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摄影界老前辈和共和国重大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

《红镜头》的撰文者顾保孜是生于1957年的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还被称为“红墙女作家”。

因为有这样的主旋律内容和作者组合，《红镜头》一书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应当说，得到这些荣誉是正常的。但我作为一位认真钻研此书的读者，在本文中列举的，却是该书中一些令人遗憾的“硬伤”，虽然这些差错不会颠覆历史事件的本质意义，但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本书的真实价值。

例一：《红镜头》128页到129页讲到李宗仁夫妇回国，竟然说他们先是乘坐“波音747飞机途径贝鲁特、雅典而后降落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然后，“1965年7月20日，一架银灰色的波音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李宗仁夫妇从上海到达北京。

波音747用于商业航行始自1970年，李宗仁回国是1965年7月，那时候连波音737都没有（737投入运营是1967年），怎么出来了747？而且，《红镜头》128页刊载的周恩来等人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的照片背景上就有李宗仁从上海到北京时乘坐的飞机——一架四螺旋桨发动机的苏制伊尔客机，机号410，根本不是“银灰色的波音飞机”。

1965年的中国，还没有喷气式客机。

史实就应经得起推敲——质疑《红镜头》左图：《红镜头》刊载的李宗仁到达首都机场的照片。照片背景的飞机即为李宗仁夫妇乘坐的专机——伊尔18客机。

本来，李宗仁乘什么型号的飞机回国根本无足轻重，完全可以忽略不提，执笔者在这里为何要理所当然地画蛇添足，连随文发表的照片也不核对一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就像是一道美食已经做好，上桌前却多余地撒进些碱面，虽然可以吃下去，但感觉很不舒服。

例二：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请上天安门，和他站在一起观看国庆游行。《红镜头》193页写道：“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将城楼下记者拍摄的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了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

这里说的第二天，是指1970年10月2日。第194页刊载的这张照片的说明写道：“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安排《人民日报》将此照片发在头版头条，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没有出现在同一画面里。”

读者从上述两段文字中得出的结论是：在1970年国庆节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而且照片中首次没有林彪（那时候这种重大政治新闻是统一版面的，全国各报都只能与《人民日报》保持一致，刊登同一张照片）。也就是说，周恩来不仅要以此照片向美国发出信息，而且还向全国人民暗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失宠。

关于这个问题，浙江财经学院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宗道一做过专门考证，一一举出各种文章和刊物对该照片发表时间的记录错误，其中也提到了《红镜头》。实际上，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的照片公开发表于1970年12月25日，国庆节后两个多月。照片发表的一周之前，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接见斯诺，两人做了长时间谈话。这张刊登于报纸头版的大照片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不是国庆节的应时新闻，而是一个十分令人意外的“旧闻”。毛、周选择这样的时机发表照片，一是为了配合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二次会面，也是为了更加突出中美关系的内在意义。但是，美国人过于迟钝，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马上嗅出其中的味道。

另外，12月25日公开发表的天安门照片中恰恰有林彪，其他的三个人是毛泽东、斯诺和翻译冀朝铸，没有斯诺夫人。书中刊载的那张没有林彪的照片不是12月25日公布的照片。《红镜头》偏偏没有选择那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有林彪画面的照片。

宗道一考证文章的发表晚于《红镜头》的出版。可见，不是《红镜头》受了其他出版物的误导，就是其他出版物受了《红镜头》的误导，但读者大都会自然而然地认可“宫廷”摄影师杜修贤的权威性。10月1日的国庆照片，本应在10月2日发表，这种理所当然，顺水推舟的思维方式，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

例三：1971年五一节，发生了林彪在焰火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不辞而别的意外事情，杜修贤是目击者之一，也是拍下据说是当晚林彪唯一一张照片的人，他的叙述应当是很吸引人的。请看《红镜头》的描述：

第193页，杜修贤说，他在1971年五一节上午“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毛泽东和林彪都来了，“第一个从大殿门口出来的是毛泽东，

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杜的感觉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第195页的文字接着说，五一节上午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道游园。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这就怪了，实际上从文革前开始（具体哪一年还需查证），五一节白天就不再举行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而是改在各大公园游园联欢，国家领导人分别到各处参加活动，与民同乐，晚上则照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只有十月一日国庆节才举行群众游行。1971年国庆节起，游行和焰火都取消了，直到1984年才搞了文革后的第一次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1971年五一节上午，杜修贤如此具体描述的重大活动，真的存在吗？

《红镜头》第197页记录，1971年五一焰火晚会，“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装，连帽子也是灰色的。”第198页，杜修贤接着说，“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然后，就是林彪迟到和不辞而别的经过，以及杜修贤回忆拍摄“仅此一张”（第204页）的林彪照片前后发生的事情。关于林彪五一晚会的“迟到”和“早退”，杜修贤的叙述是迄今为止最直接最权威的叙述，但是这个叙述因为其背景介绍的不确而带来很多疑点。

首先，如果林彪1971年五一节白天陪同毛泽东上过天安门，检阅了“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当晚在天安门上做出暂短露面后又不辞而别的不寻常举动。

还有，如果杜修贤真的在上午拍到了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的合影，周恩来就不会在当天晚上林彪突然离去后，为担心没有林彪参加五一活动的照片而发火，责备记者。

当然，最权威的证据仍是当年的报纸。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套红竖排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报道内容的开头是：“新华社一日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晚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一起，欢度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当天报纸的全部报道，都未提到五一节白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的事，而是明确为“今晚”（即五一晚上）。《红镜头》引述周恩来五一晚上责备新闻记者未能及时拍到林彪的电视电影镜头的话：“上午他（指林彪）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动员他参加晚上的活动”（第203页），“上午的活动”是什么？周恩来真的讲了这句话吗？毛泽东、林彪“上午”到天安门“参加了活动”，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为什么不登报？

因此，杜修贤说的这段毛泽东、林彪1971年五一上午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负责干部、检阅游行队伍的事情，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说斯诺照片的错误还是时间上的误差，那么这一段五一“群众游行”的叙述就完全是无中生有了，令人几乎无法解释。而且，《红镜头》中也没有刊出1971年五一节白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我们见识不到杜修贤所说的林彪的“单薄”和“不上照”。

更奇怪的是，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的两

幅照片，而不是杜修贤所说的“仅此一张”照片。这两幅照片是：头版右侧上方一张，是毛泽东、林彪、董必武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天安门焰火晚会上围坐一桌的照片，照片说明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上一起观看焰火。新华社记者摄。”显然，这就是杜修贤拍摄的那张据称是当晚“仅此一张”有林彪画面的照片。

头版右侧中部的第二张照片，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步行接受众军人手持语录本欢迎的照片。毛、林、周三人的着装均与五一当天焰火晚会时的着装一致：毛穿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林穿军装、呢大衣，照片背景为全黑色，表明是夜间。照片上除了人物外没有其他景物，与上一张照片显示的天安门广场灯光和建筑物的景象不一样。照片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这一张照片是谁拍的？据杜修贤说，“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规定”（第197页）。五一当晚第一线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镜头的记者）只有杜修贤一人，杜老怎能忘记？也许是把当晚拍摄的这个镜头错记成上午？别人为什么不提醒一下，帮他考证考证呢？

如果这第二张照片确实摄于1971年五一当晚，林彪“迟到”说就不成立。而且，说桌边照是林彪当晚“仅此一张”的照片也不成立。如果杜修贤说的是真的，那这张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照片就是假的，二者必居其一。不知杜老能否回忆得起来，加以解释？

五一照片的事再一次说明，即使是亲历者的讲述，也会因为时间漫长记忆差错而与事实不符，甚至完全相反。

例四：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决定隔离审查黄吴李邱“四大将”。《红镜头》在第220页说：“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

这是又一个不可思议的硬伤。中央何时处理黄吴李邱，九一三事件后早已公布于众，为什么专业党史出版社还犯这样的错误？该书在第221页发表了一张照片，是周恩来、叶剑英和邱会作等人访问越南时举行仪式的合影，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等也在场。但照片的说明并不提画面具体内容，也不标明摄影年份和日期，而是说：“为了不打草惊蛇，国庆后中央决定让邱会作（前排右三）出访越南。10月底邱会作在人民大会堂被捕。”那张照片似乎是要为这句话作证。

问题在于，那张周、叶、邱访越的照片根本不是拍摄于1971年10月。1971年周恩来正式访问越南是在3月，那年10月没有出访。《红镜头》文中所说的1971年“国庆节后”还让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是根本不存在的事。试问，如果邱会作“率团”，难道照片中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竟是邱会作“率领”的“团员”吗？但稍微粗心的读者看了，第一印象却认为那是一张摄于1971年“国庆节后”的照片，并相信邱确实在10月底才被捕。

实际上，逮捕黄吴李邱是在1971年9月24日，没过国庆节。那一天邱会作确实去了机场，也确实与越南有关，但那是为李先念访问越南送行。邱从机场回到人民大会堂即被捕。

这种严肃的出版物，出这样大的差错，是不应该的。特别是《红镜头》这样以历史照片为主题的著作，应当以照片引领文字内容，用文字内容说明照片的客观历史事实；而不是以文字内容规定照片，用历史照片去证实既定的文字内容。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编纂方法，后者就可能导致邱会作访越照片的说明错误。

从《红镜头》的诸多硬伤，可以就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叙述的判读上得出几条经验：

一、亲历者的讲述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不可全信。因为时间的推移、记忆的误差、事件的复杂、个人的角度等等因素，亲历者也很可能出现叙事失误。以上举的例子都是与客观事件有关的时间、地点、具体细节的出入，还没有涉及因为个人立场、利害关系而有意无意加工或掩盖的情况，那些就更复杂了。因此，对历史的回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反复对证，多角度研判，才能不断去伪存真。

二、白纸黑字的正式出版物，可以作为资料研读、保存，也可以引用。但白纸黑字也需横向纵向比较，引用和阅读时要区分可信度。杜修贤与中央高层有长时间的个人接触，他的叙述应该是权威的，但即使如此，也要区分情况，经过梳理才能采信。比如，拍照杜修贤是权威，但照片何时发表、怎样发表，他的解释就不那么权威；杜修贤拍摄的记录历史瞬间的照片是权威的，但他就历史事件所作的说明却不一定权威，经他人转述的内容就更差一等，而一般读者对此很难区分。公开发行的新闻报刊、正式公布的宣言布告、保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原件等，是研讨历史的凭据。《红镜头》上公布了那么多现场照片，又有白纸黑字的说明，但如果不知还有更权威更原始的“白纸黑字”，不进行多方位比较，就会出错。有1970年和1971年的《人民日报》为证，就不能再引用《红镜头》上关于发表斯诺照片和五一照片的文字，因为《红镜头》不是原始记录，虽然它也是“白纸黑字”的正式出版物。

三、回顾历史，即使是亲历，也要十分谨慎。许多叙述者将亲历和耳闻混为一谈，将所见和推测合为一体，将真实的事件纳入不真实的背景，或用真实的背景掩盖不真实的事件。这里有本人的水平阅历问题，因为历史事件幸存的亲历者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讲述者；也有个人利益和立场的制约，有意无意地偏离真相，或片面叙述。《红镜头》称陈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挨整，原因竟是他反对“天才论”，“遭到林彪亲信的攻击”（第180页），第177页的标题是：“陈毅不同意林彪的‘天才论’，成众矢之的”。第一，这不是杜修贤的亲历，虽然他到了庐山，甚至和陈毅有个人接触，但他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幕；第二，陈毅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反对“天才论”。在会议初期讨论林彪讲话时，有不明真相的人怀疑陈毅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事关重大，必须表态，于是陈毅对“天才”的概念做了自己的解释，并说：“现在还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陈毅年谱》下卷1216—121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当陈毅知道林彪的讲话是针对张春桥时，更明确地对林的讲话表示了支持。为此，事后陈毅被扣了顶“二陈合流（陈伯达、陈毅）”的帽子，并得到毛泽东认可，陈毅不得不做出检讨。陈毅的检讨显然不是向“林彪亲信”们做的。如果说陈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攻击”，成为“众矢之的”，那绝不是因为他得罪了“林彪亲信”，而是因为他曾表态赞成林彪的讲话和陈伯达的发言，被康生等人抓住了把柄。《红镜头》在这里是“为尊者讳”。但一般读者会被误导，以为杜修贤上了庐山，就是“亲历者”。

我读到的《红镜头》出版于2006年，而不是1996年，更不是1986年，关于文革和九一三事件的内幕，虽然还远未完全公开，但2006年时的素材已经比以前大大丰富了。在出版有关领袖和文革内容的书籍时，要经过出版社、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办的三重审批，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专业的党史出版社，为什么会犯上述业余级的错误？为什么那么多的硬伤能够通过三级审查？或许是审查者也认为作者是权威叙述者，不想“班门弄斧”吧。

最后声明，本文只是以《红镜头》为例，阐述历史研究、考证和编辑出版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而这种失误是在许多人身上都会发生的，甚至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本人对杜修贤前辈及其作品是尊重的。我的上述考证也可能会有失误，欢迎批评指正。

~~~~~  
【拒绝遗忘】

国家道歉和法律赔偿

• 唐 燕 •

—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了明确的结论：文革错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上亿人受到牵连，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文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痛已经成了我们民族记忆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抹去。要想从过去的痛苦记忆中走出来，就应由国家作为责任主体向受害人道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这一页彻底翻过去。没有国家的正式道歉，文革的罪责就永远没法了结。

有人说，国家道歉是一种奢望，是个白日梦，国家何时道过歉？

实际上，古今中（台湾）外，都有过国家道歉。

1、古代中国，号称“朕即国家”的皇帝道过歉：

据学者萧翰统计，我国古代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他们在发生了或天灾或人祸后从自己身上找导致灾难的原因，并下发自我批评的诏书，反省自己的过失及公布改正的措施，以求得臣民的谅解。一般说来，这无损于他们的威望，因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罪己诏后，天子显得更加圣明了。

2、当今，台湾政府多次为2·28事件正式道过歉，直到去年7月，马英九政府还再次道了歉：

1990年初台湾立法院首次集体为2·28事件受难者默哀；1995年李登辉总统代表政府向所有2·28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并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台湾政府定于每年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全国各机关降半旗哀悼；在台北等多地建立了多个2·28纪念公园，台北“2·28和平纪念公园”内还建有纪念馆和纪念碑；台湾邮政多次发行2·28纪念邮票；纪念2·28的歌曲、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3、现当代，西方国家对政府道歉已达共识：

在当今世界，现实常常被历史困扰，如何处理历史旧账，怎样才能达成和解，人类彼此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因历史原因造成的伤痛如何治愈，已经成为文明社会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关于这类问题许多国家都遭遇过、讨论过，最终的共识和结果是：由时任政府代表国家对受害者郑重道歉。

美国和加拿大都已经有了《道歉法》（Apologize Act），国家通过道歉的方式解决官民纠

纷，偿还历史旧账已纳入法律，成为常态。

据不完全统计：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道歉；

1990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波兰道歉，承认在卡廷森林杀害数千名波兰人；

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

1993年叶利钦总统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

1995年7月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法国在被德国占领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

1997年10月挪威哈拉尔五世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

2000年千禧弥撒上教皇保罗二世为基督教会两千年来所犯下的种种不义请求宽恕；

2006年6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华人铁路工人道歉，同时为1923年“人头税”停征后实施的《排华法案》表示最深切悔过；

2008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走的一代”道歉，澳大利亚还把每年5月26日定为国家道歉日（National Sorry Day）；

2013年8月菲律宾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理事主席培瑞斯抵达台湾，代表总统阿基诺三世亲自向被菲公务船射杀的渔民洪石成的家属致歉。

## 二

文革罪恶具有制度性、欺骗性和群体性特征，文革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都不单纯是案件责任人个人的主观意志和孤立的刑事案件，而是在党和领袖号召下以文革为名义的群众运动行为，故而应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

当年审判四人帮后就应允许公民起诉追究各种伤害及致死人命的刑事案，可是那时我们是以各级党组织“落实政策”代替法律走司法程序，根本不予立案。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自2010年12月1日才开始实施，无法惠及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且《刑法》还有个20年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可是在那20年里，文革1700余万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属何尝被给予过起诉的权力？

1966年8月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尧再勇敢也不可能在粉碎四人帮前翻文革的案、否定红卫兵小将，去已被砸烂的公检法起诉，进行“反革命活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4月，他提交了起诉书。可是1981年3月被北京市西城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XXX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王晶尧不屈不挠，几经曲折，最后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却答复全国人代会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依旧以事件“逾期”为由，维持免于起诉的决定。

显然，无论是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还是2010年的《国家赔偿法》，其“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都对发生在持续十年才宣告结束的文革中的刑事案件不公道、不适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法院从未受理过文革死难者的刑事案，更无人获国家道歉和赔偿。这是造成民众分裂、没有真相及无法和解的根本原因。



既然如此，那就应针对文革遗留的刑事案件的专项赔偿立法。这种作法在国外不是没有先例。

例如，美国国会在1988年通过了由里根总统签署的法案，代表美国政府向二战期间拘禁隔离日裔事件道歉。该法案说，政府当时的行动是基于“种族偏见，战中的不安情绪和政治领导层的失败”。受害日裔每人获赔两万美元，并附一封时任总统老布什签名的道歉信。

同期，加拿大总理玛尔罗尼也正式对当年针对日裔的行动向加拿大日裔道了歉，并给了所有当年被隔离的幸存者经济赔偿。

他们处理历史冤案的作法是：司法赔偿+总统签发道歉信。

如今早已不是党和领袖即红太阳、永远是真理化身的年代了。错了就该道歉，就该给受害人赔偿。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才值得尊敬，才是有实力的表现。而且这种道歉和赔偿永远不应有“逾期”之说。

世界各国的专项赔偿和追诉法案都没有时间限制，例如加拿大的华人额外人头税就是120年后才立案赔偿的。

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法治，法律是人定的，其宗旨即公平公正。

中国自古以来“私设公堂，逼死人命”都是重罪，而且私设公堂还是侵犯皇权的僭越罪。我们至今对文革中“私设公堂，逼死人命”拒绝立案，那么法律何在？公理何在？

像卞案这类遗留的文革刑事案件如果在习李政府还剩的九年里仍旧得不到解决，其真相就只能让后代雾里看花，仇恨也永远无法消解了。

□ 摘自《共识网》2014-04-22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